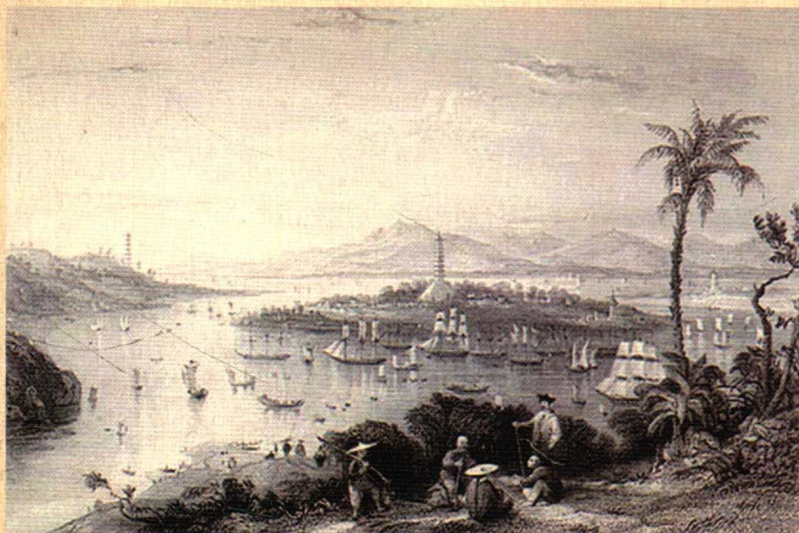


遗大投艰集

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上)

陈春声 刘志伟◎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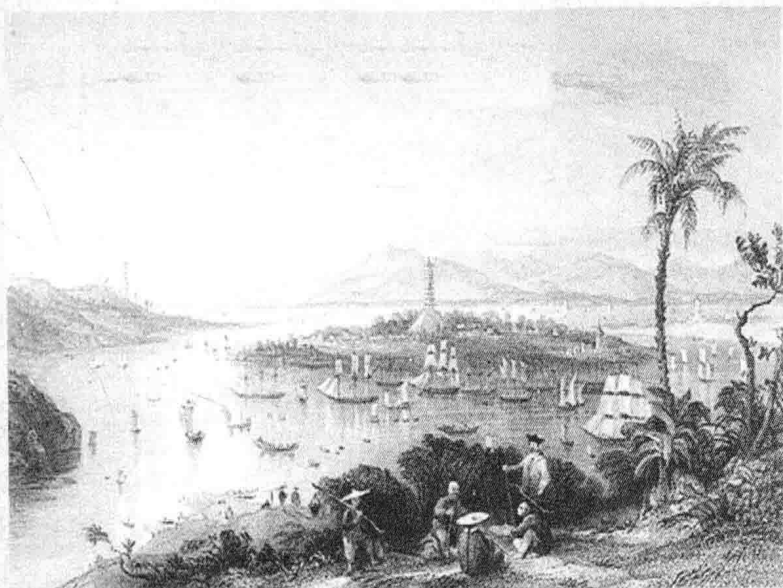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遗大投艰集

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上)

陈春声 刘志伟◎主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遗大投艰集：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上、下）/陈春声，刘志伟主编.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7-218-08498-5

I. ①遗… II. ①陈…②刘… III. ①梁方仲（1908—1970）-纪念文集
IV. ①K825. 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2135 号

YIDATOUJIANJI; JINIANLIANGFANGZHONGJIAOSHOU DANCHEN YIBAI ZHOUNIAN

遗大投艰集：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一百周年

陈春声 刘志伟 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莹

责任编辑：柏峰 张贤明 陈其伟 李展鹏

装帧设计：新角度

责任技编：周杰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真：(020) 83780199

网址：<http://www.gdpph.com>

印刷：广州嘉正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书号：ISBN 978-7-218-08498-5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74.5 插页：6 字数：120千

版次：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198.00元（上、下）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络：020-83790604 020-83791487 邮购热线：020-83795749

题 记

本集之书名出自《尚书·大诰》，其文曰：“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孔安国传：“我周家为天下役事，遗我甚大，投此艰难于我身。”梁方仲先生曾于病榻中赋诗用此典以表其心志云：“天留迂腐遗方大，路失因循复倘艰。”在梁方仲先生诞辰 100 周年之际，我们于 2008 年 11 月举办了“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 100 周年暨中国社会经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中国经济史研究之鸿儒硕彦聚首一堂，缅怀先生业绩，发表研究心得。先生当年以一迂公之身，艰难开造之天役，于此盛会得见其大观。会后，承蒙与会学者惠赐大作，俾编次成帙，遂借“遗大投艰”题书名，以表吾辈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之天役，不袭因循，独立艰行之矢志，慰先生于天国，传香烟于后来。信作者诸君，皆心同此愿！是为记。

——编者

《遗大投艰集》编辑委员会

顾 问：梁承邨

主 编：陈春声 刘志伟

委 员：（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春声 董志凯 戴 和 黄启臣 李伯重

李龙潜 刘志伟 杨生民 叶显恩 周秀鸾

编辑助理：周惊涛

呈献在梁仲衡先生前的四首杂忆

汪敬虞

我的研究历程中的启蒙阶段是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度过的。194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转行的老师，潘云先生介绍得以进入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当时社会学之地名义上设在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实际上到了李庄镇，过其南走上将近10里的山路。这一带是山区丘陵地带，故炊烟起来也颇有几分烟火的味道。研究所的宿舍就住在一名叫竹管田的地庄园里面。至于有隶属的人住的那个庄园的名称，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

李庄镇原是一个条件艰苦，几乎没有生活必需品的地方。但我们的每位和生活条件更加艰苦。这个庄园的正房仍然保留地一家而建的十来个外单身汉所组成的大家伙，从统一栋在庄园的下层，全体研究人员的办公室，是一间一梯一层的火炕炕。楼上原是地主子女们读书的卧房。底层则原来是一个平棚，临时改其基坐着可以得上等张桌椅。这广小而简陋也进不了多少老钱。当年正在与马中国转业

之名最》的华中军说生就是在李庄的入口处，造成了他的成名著作。十年后就以胡严先生又进入了另一种时期。这时，梁先生自述道：“这没有什么，那甲就住过了。”

在这个简陋的小山庄里，不仅住进这一类军械部部队的煤油灯也是稀有之物。因此一到晚上，每人面对的几盏油灯下，却不乏领导累放不倦的夜晚。胡严先生曾与我同住一室的另一位经济史学专家胡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我习惯早睡的人，及在寂寞，睡得早醒得也早，经常天尚未明，我已早醒来。早晨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在我已经醒来，睡眼未开之际，胡先生却正提着小菜油灯，随着脚边轻轻地吹灭油灯就寝。也许正由于他总早过地熄灯，这盏小菜油灯，所以后来也过早地熄灭了自己的生命之火。

在我这一群人当中，不但有不舍昼夜的新人，也有不解释半信的前辈。如果说在胡先生那里没有按部就班的守夜之夜，那么，在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史学专家梁仲衡先生那里，就没有“今天或休息的星期天”。根据梁先生有期过长期交往的季义治先生回忆，他在星期天去梁先生讨论问题时，常常会碰到梁先生这样地发问：“今天又是星期天？”梁先生的仗义是不受星期天的限制的。和经常夜谈的季义治先生一样，

这位梁先生记假日休息的出外学，也在他应该该离开的时候，离开了他一刻也离不开的学术征途。

也许由于那时还是一个没有开窍的小学吧，在考候时，我曾有人谈过一条法则的研究是梁先生（梁仲衡）的盲点。时，我虽然口中不无心中却有一道终身一条“梁仲衡”的疑惑。等到梁先生某年早退以后，他后读着《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出版之时，我从《中国近代史》才知道这是“生前多身悉心编纂的遗稿”。全书根据民国二十五年、现代政府的地方志、文集以及近代所编有关统计材料，将我国自西汉到清末二百多年间历代户口、田地、田赋数字，经过考校测算，分门别类，综合编辑为二百多组表格，对于一切重要数字，加以详尽注释，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而书前的总序，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关于人口、土地调查登记的特征作一简略的沿革；书后的附录，又对中国历代度量衡之变迁发展时期的特征，详加剖析。全书共刊用达300余种之图。梁先生省悟了打好一条法则的研究基础，梁先生耗尽了全体的精力，以至忘记星期又休息的比事。

当然，也曾有人不住在这个远离小镇的农村。陶孟和所长和汪云三先生流居各家住在李庄镇上。我到所的第一天，汪先生恰好就在梁先生的家里。当我被引导到梁先生家中之

时，他约的人正谈得兴高采烈。其中有一段对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梁先生问汪先生：“你在上海回来，还记不记得梁仲衡？”汪先生很快地回答：“不记不记，我也记不起来。”对此，梁先生说了三个英文字，并重复了两遍：“So do you.”

接着，多以愉快而又恍惚的三个字，多么轻松而又沉稳的三个字！

2008, 11, 3.

汪敬虞研究员为大会撰写专文的手稿

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李萍教授在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首先，我谨代表中山大学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今年是梁方仲教授诞辰 100 周年纪念，为了缅怀梁方仲教授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卓越贡献，由中国经济史学会、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共同发起，举办纪念梁方仲教授诞辰 100 周年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英国、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台湾及大陆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的近百名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各个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相聚在中山大学，交流切磋，以学术研讨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梁方仲教授的深切缅怀与敬意。梁方仲教授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山大学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开拓者，他在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执教多年，为中山大学的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他严谨务实的学风和独具特色的教学风格奠定了中山大学明清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基础。他率先在国内同时培养多名明清经济史的研究生，从当时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出发，吸取国外高等教育的先进经验，并结合自己的学术经历，培养了一代在明清经济史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享有国际学术声誉的学者。令人欣慰的是，梁方仲教授开创的学术传统直至今今天仍后继有人、蓬勃发展。梁方仲教授的明代一条鞭法研究，直到今天仍然被国际学术界公认是该领域最高水平的研究。在中山大学执教期间，梁方仲教授成果杰出，撰写并出版了《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等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教学科研之余，梁方仲教授还



承担了繁重的教育工作，1955年学校成立《中山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梁方仲教授被许崇清校长聘为编委；1957年起梁方仲教授陆续被聘为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并连任学校第二届校务委员会委员及中山大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在中山大学的历史上，梁方仲教授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梁方仲教授的功绩是中山大学人的骄傲，也是值得我们后人景仰和学习的。最后，请允许我再次代表学校向参加会议的学者和梁方仲教授的家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向长期关心和支持我校事业发展的学术界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谢谢！

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董志凯研究员 在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

上午好！

值此梁方仲教授诞辰 100 周年纪念活动隆重开展之际，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学会祝贺会议召开，深切缅怀梁先生的高尚情操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卓越贡献。

梁方仲先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史研究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他于 1934 年 2 月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1937 年 6 月，受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派遣赴日本进行学术考察，不久因“七七事变”爆发，毅然中断原定一至两年的考察，提前于 8 月返国。回国后随社会科学研究所由南京迁长沙、桂林、昆明，于 1940 年至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其间于 1938 至 1939 年在陕甘地区进行为期八个月的农村土地调查，并经周恩来批准到延安近两个月。1943 年与陈寅恪、闻一多、汤用彤等人获哈佛燕京学社奖金。1944 年受中央研究院派遣与丁声树、全汉昇一起赴美进行学术考察，被哈佛大学经济系聘为研究员，任期两年。1946 年 9 月，到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其间被聘为中国代表团专员赴法国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届大会。1948 年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患病，梁先生代理所务。直至 1949 年 2 月，因母亲病，回广州侍亲。此后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任教。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1949 年以后陆续变更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梁先生的研究与管

理工作同今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具有延承关系。

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梁先生与汤象龙先生一起组织领导有关人员，海量抄录整理清代军机处和内阁档案中有关清代社会经济史资料十万多件，开创了我国经济史研究中大量发掘和利用清代档案之先河。同时与吴晗、汤象龙、罗尔纲等人发起组织“史学研究会”，力主以研究人民、社会为主体的新史学，在天津《益世报》、南京《中央日报》开辟《史学》专栏，后来又与汤象龙先生等共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

梁先生毕生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在社会科学研究所期间，梁先生先后发表《明代两税税目》、《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一条鞭法》、《明代的兵》、《明代银矿考》、《明代的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对于驿运的几点贡献》、《田赋史上起运存留的划分与道路远近的关系》、《释一条鞭法》等重要论著。其中发表于1936年的《一条鞭法》，次年即被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在《历史学研究》上连载。1956年，《一条鞭法》一文又与《释一条鞭法》合并译成英文，列为《哈佛东亚研究丛刊》第一辑，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梁先生在经济研究所的前身社会研究所工作了15年，经济研究所在经济史研究方面所做出的成绩，是和梁先生等老一代学者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

他们抄录和搜集的大量资料，成为本所经济史研究的宝贵财富；

他们从编年着手，放长视野，进行纵向联系研究，高度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成为本所经济史研究的传统方法；

他们重视史料与理论结合、重视计量研究，构成经济所扎实严谨的学风；

他们注重学术研究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梁先生提出要“随时代进步”，要撰写“适合时代要求”的作品，主张治史应该“叙述社会变迁、经济变化和文化的进步”，历史研究应以“整个民族和民族的发展为主体”等思想，构成经济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精神所在。

他们的著述已经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遗产，至今还在启迪和滋润后人。

今天，我们纪念梁方仲先生诞辰100周年，缅怀他的业绩，就是要发扬他

的精神，把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推向深入，做得更好。

感谢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为会议召开所做的不懈努力！

祝与会嘉宾研讨愉快！祝会议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清华大学历史系李伯重教授在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各位领导、各位同行、各位同学：

今天是梁方仲先生百岁冥寿纪念，我们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中国社会经济史奠基人之一的伟大贡献。梁方仲先生在16岁的时候就考进了清华，先后在农学系、西洋文学系、经济系学习，在清华读完本科又读了硕士研究生。梁先生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正是清华文科的繁荣时代，大师云集，学生也极一时之选。梁先生在这个环境中充分地吸收了清华学术的精华，得到了清华学风的熏陶，对他日后的学术基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里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当时清华中西交融、中西贯通的学术传统在梁先生的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梁先生从清华毕业之后，像陈寅恪先生一样，历尽东、西两洋，在中外最好的学术机构，像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哈佛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等世界一流的机构里学习、工作和研究，充分吸取了各国经济史学的精华，取精用宏，从而开创了一代风气，成为我国经济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梁先生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40年，呕心沥血，为经济史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成果表现了他做人的才华和深厚的功底，也把清华中西交融、中西贯通的传统推到了极致，这是梁先生对母校最好的回报，为清华历史也增添了光辉的一页，所以清华非常感谢梁先生，为出了像梁先生这样优秀的学生感到骄傲和自豪。

20世纪的中国充满着变化，曾经培养出了像梁方仲先生、张荫麟先生、吴承明先生、吴晗先生、何炳棣先生这样的一批社会经济史学大家的清华，在1952年整个文科被连根拔去，这令梁先生感到非常痛心。时隔半个世纪之后，清华文科特别是社会经济史学科又重新恢复，不过时过境迁，要重建历史学科

当然是非常困难。但是，所幸的是，梁先生的风范还在，为清华重建经济史学科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同时，梁先生最后 30 年在中山大学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薪火相传，使得中山大学的中国经济史今天蔚成气候，成为重镇。中山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和梁先生曾经工作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身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对清华大学经济史学的重建给了无私的援助，我想这也是梁先生在天之灵对清华的回报，也是梁先生隐德所及。所以，清华也深深地感谢她的优秀学生对母校的反哺。

应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社会经济史学科出现了百年未有的大好形势，我们这些在梁先生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经济史学者一定会秉承梁先生的遗志，把梁先生的未竟之业推到更高的高度，以此来告慰梁先生的在天之灵。谢谢！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杨生民教授在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各位领导、各位学者专家、各位同学：

梁方仲先生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著名奠基人之一，具有国际声誉的著名经济史专家。深信此次会议的召开，对我们学习梁方仲教授的治学态度、治学精神一定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现在我想就梁老师对我的教育和指导谈一些回忆、谈几件事例。

我曾经将文章拿给梁先生看，梁先生看后找我谈话，说好文章的标准就是看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是否符合历史实际，并拿出一本《历代食货志汇编》让我参考。

梁先生曾开一门“怎么使用工具书”的课，听课的有我以及两位外校在中大进修的教师。讲课时，每讲一部书或一类书，梁先生都作一简单介绍，而后教学生实际使用。对不能一下掌握的，梁先生就让反复练习，一直到会用为止。这门课实用性强，指出了治学的具体的门径、道路、方法，使我终生受益。

梁先生的《〈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在《北京师范学院学报》发表后，受到社会的好评。宁可先生评价说是一句一句笺证的，这是不假的。有的学历史的美籍华人还托人专门到编辑部求购。

我觉得，我们应当继承、发扬梁老师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和平易近人的精神，为使中国史学进一步发展而努力奋斗。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叶显恩研究员 在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同学：

值此梁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在这里举行如此隆重的纪念盛会，我非常高兴。我想借这个机会，代表广东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从业人员、同仁们向大会表示祝贺！

方仲先生 1933 年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同年入北平社会调查所，也是后来的社会所。所长是陶孟和，陶先生是“中国最早的专业社会学家”，是中国社会学的主要创始人。方仲先生攻读的是经济史，就为陶先生所赏识，而且得到加意培养，寄意“成璧”。这就是梁先生将社会学和经济学结缘的开始。他一生的学术实践证明：他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创建、拓展，并且为之奉献终生。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中期，方仲先生撰写的一系列著作，如《明代粮长制度》、《一条鞭法》、《明代黄册》等，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起到开拓性和奠基性的作用，因而，赢得国内外学术界的赞誉，被称为“明代社会经济史专家”。为了推进这一学科的研究，方仲先生与志同道合的吴晗、汤象龙等发起“史学研究会”，于 1934 年在北京宣布成立。提出三大主张：一是研究“整个民族”为主体的“社会变迁史”；二是先有“专门的研究，然后才有产生完整历史的可能”；三是注重史料搜集，“没有大量的历史资料，是不可能写出好的历史的”。这些主张在当时不失为振聋发聩的声音，今天看来依然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1944年9月，方仲先生应聘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期两年的研究。1946年9月转往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做研究。当时，哈佛大学的阿欧尔教授和伦敦大学的托尼教授都是富有盛名的经济学家。经与这两位学者接触后，他对阿欧尔的理论并不欣赏，而对托尼的许多学术观点，或有认同，或则相近。托尼是他在伦敦大学学术研究的指导者。托尼是费边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16世纪的土地问题》、《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乡绅的兴起》等著作都是社会经济史的著名论著。托尼研究的不是纯粹的经济史，而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交叉史。这正是方仲先生与之见解近似之处。方仲先生自认为受托尼的“启发不少”。

方仲先生重视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考辨，把历史资料看作是史学的生命力。资料的翔实和丰富，成为梁先生著作的重要特色，并且一直为学界所称许。在他看来，原始资料是不能更改的，而结论却可以随着资料发掘的不断增多而屡做改变。但是，这些资料也经历着史家让它复活的过程。梁先生善于把零散的似乎互不相干的、不说明问题的资料按时、空、人、事串起来，使它说出话来，说出甚至从来没有被人注意的历史现象。先生之所以注重民间文书、档案和民间俗本、平话之类的资料，是因为他认为愈被视为平常、愈是大量发生的事情，往往为正史、政书所忽略。而这些正是重建基层社会经济史所必需的史料。即使是虚假的资料，通过揭开其背后隐藏的意图、动机，说明伪造者当时的情形，也可以获得新的真实史料。

实地调查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手段，历来为陶孟和先生所重视。加盟于陶先生主政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自当以实地调查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对实地考察的研究手段，方仲先生不仅认同，而且亲身历练。刚才已有提及了，我不想再重复了。

方仲先生对当年他参加创办的“史学研究会”提出的三大主张，终生服膺，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他以田赋制度作为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衔接点来研究，正是放眼于中华民族历史的总体，尤其着重于以农民为主体的基层社会变迁史。方仲先生视资料为史学的生命，其著作以史料翔实而丰富见长，也正是服膺他和他的学术同仁当年提出的重视史料的主张。至于当年提出的先作专

题研究，在此基础上做整体史研究的主张，方仲先生也是遵循无误的。他计划在他围绕田赋史已写出的专题文章的基础上，先完成《13—17世纪中国经济史》，然后再准备撰写《中国田赋史》，进而写《中国经济史讲义》，构建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学术体系。

方仲先生不仅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有开创之功，而且为这门学科的拓展、完善作了无怨无悔的奉献。我认为，他的《一条鞭法》、《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三部著作可当代表作，堪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丰碑。

对梁先生这样杰出的学者，应当有不同形式的传记出现，以再现这位富有学术魅力和人格魅力的先贤的业绩、影响、精神。

谢谢大家！